

陆其国 著

风潇雨晦

民国文人恩怨

FENG XIAO YU HUI MIN GUO WEN REN EN YUAN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風雨
滿晦

陸其國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潇雨晦：民国文人恩怨 / 陆其国著. —上海：
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8.8
(民国文人系列)
ISBN 978-7-5326-5182-5

I. ①风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文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69190 号

风潇雨晦——民国文人恩怨

陆其国 著

责任编辑 刘大立

装帧设计 多吉

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辞书出版社(www.cishu.com.cn)

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(200040)

印 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2.75

字 数 210 000
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26-5182-5/K · 1103

定 价 39.8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 021-59815621

且说一场文坛“茶话会”（代序）

一切还得从一幅老漫画说起。

这幅老漫画有个题目：《文坛茶话图》。我已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年初遇这幅老漫画的，只记得一见之下就再也忘不了它。现在想来，漫画画得水准如何并不是最主要的，重要的是画中出现的那些人物——要知道，他们中许多人的尊姓大名对我来说，可都是如雷贯耳！

《文坛茶话图》



这幅老漫画描绘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名流俊杰群贤毕至，济济一堂，在茶话会上聚聊的场景。画中人物形象堪称神情毕肖，尽管画家落笔线条简练，但不难见出人物喜怒哀乐的神情笑貌极其个性。不夸张地说，如果细细品读，通过这幅老漫画中一些人物神态各异的肢体语言，或还可以读到当年文坛若干重要或不怎么重要的信息。比如发生在这些作家、艺术家中某些人之间恩恩怨怨的今事与往事、大事与小事……须知当年这幅漫画甫一问世，即风靡漫画界、文化界，可谓影响深远。

好了，现在应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，这幅老漫画中各色人物的尊容了。

可以看出，因为与会者众，会议室空间不大，人一多就显出局促。不过也许因为只是举行一场茶话会的缘故吧，感觉上似乎少了一些正式会议上多会呈现的拘谨和严肃。从围桌或坐或站者的那种或悠然或淡定或超然物外的神态，也可以想象这场茶话会的气氛其实不乏松弛。

不言而喻，大凡只要是会，总得有人主持，画中这场文坛茶话会亦然。坐在文坛茶话会主席座那位正坦然微笑着看着众人的儒雅之士，便是“不差钱”，且好客待人的著名记者邵洵美，画家因此冠其以“孟尝君”之誉。邵洵美身后墙上挂着的左为袁中郎像，右为高尔基像。另一侧墙上从左往右挂着的分别是彭家煌、蒋光慈、徐志摩、刘半农画像。坐在邵洵美右边的是茅盾，左边是郁达夫。郁达夫左边口衔雪茄的是林语堂，依次往左是老舍、冰心、张资平、白薇。因为恰好坐在两位女士中间，有着“三角恋爱小说家”名声的张资平，也因此被人不时调侃了一把。继续往左便是洪深，他的神情似乎有点严肃得不合氛围，也因此有人解读他这是在构思电影剧本；他左边那位以手扶腮，不知是在深思、偷听还是在瞌睡的是傅东华。不过在理解上我也许会更多地偏向前一种猜测，因为在他身后站立着娓娓交谈的，正是鲁迅和巴金。鲁迅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，巴金则一脸认真地聆听着。显然是他俩谈的内容引起了傅东华的兴趣。

坐在傅东华左边的是周作人，一眼看去，他仿佛心事重重，一脸若有所思状。知堂老人此时此刻在想什么呢，写作、翻译抑或出版问题？坐在他左边的是郑振铎，同样是一脸的若有所思，我倒更愿意相信郑振铎此时所思更多的是正在写作中的著作。郑振铎下首正转脸面对画面“镜头”的是沈从文；然后依次是杜衡、张天翼、

鲁彦。看来这场“茶话会”或许有点名实不相符，因为在这几位面前搁着的并不是茶壶而是酒壶。察诸全桌，除了林语堂、老舍面前那只疑似酒瓶外，就只有一只酒瓶，而且张、鲁二人即使回首看着什么，也是手不离杯，那应该不是茶杯而更像是酒杯。有意思的是，更有解读者就像身临其境的当事人，直言他们喝的是五茄皮。

视线转到另一边。茅盾下首持杯回望者便是施蛰存。邻边背对镜头坐的是凌叔华。画面右下角站立的五人从右起分别是现代主义的徐霞村、穆时英、刘呐鸥；手上持书的是叶灵凤，他伸出的右手似乎是想去拉正欲离席的高明。有人解读手插裤袋、一脸怒容的高明，恰是因为看到鲁迅而要拂袖离去。

这场茶话会不管是否已经开始，但我们毕竟看到有人端坐（比如邵洵美、茅盾），有人走动（比如鲁迅、巴金），有人正欲离开（比如高明）……请注意，这时候也正有几位姗姗来迟。看到漫画上方了吧，是的，就在林语堂、老舍身后推门而入，已现出半个身子和脑袋的便是田汉，紧跟在他后面的是丁玲，只是不知跟在丁玲身后的是谁。

从网上查阅得知，这幅老漫画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《六艺》杂志创刊号。“六艺”者，文学、戏剧、电影、音乐、绘画、雕塑之谓也。高明、姚苏凤、叶灵凤、穆时英、刘呐鸥均为该刊编辑。漫画作者署名鲁少飞，系著名漫画家。当我们“认识”了画中这些文坛名人以后，是否也意识到了在他们中一些人身上出现的“恩恩怨怨”信息的蛛丝马迹呢？这里暂且不说其他，有一个故事就颇令人觉得有点“扑朔迷离”，那就是据说鲁少飞本人生前曾否认自己是这幅漫画的作者。于是对此也就有了各种猜测，比如有人猜想这是鲁少飞担心有入画作家对画感到不满意；也有人觉得这是鲁少飞怕得罪了哪位当事人因而选择“失忆”；或者觉得他就是在刻意回避什么。

当然也有持异议者，比如当年的老漫画家季小波就觉得从画技和画风看，《文坛茶话图》更像出自漫画家汪子美的手笔，并认为该画署名“鲁少飞”，一定是哪个环节有意无意的“失误”。不过由此亦可见，《文坛茶话图》呈现的并非全是一派祥和盛况，背后也是有着一一些不谐之音，一如我们理解“恩怨”这个词，它除了“恩”，同时又与“怨”相涉。“恩”本无碍，而“怨”的出现，对于文坛健康发展而言，毕竟不值得称道；哪怕是抱怨、埋怨，那也是一种“怨”。也正是由一些“扑朔迷离”的大小情状，我或清晰或依稀感觉到了当时文坛那种风急雨骤、天色

昏暗、大雨欲来的情状。于是就下意识地想起了“风潇雨晦”这句成语。该成语出自《诗经·郑风·风雨》：“风雨潇潇，鸡鸣胶胶，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瘳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。”“瘳”有病愈之义，对应下一句的“喜”字，应该象征有云开雾散、风雨过后的寓意。因此是否可以说，尽管外面透着风急雨骤、天色昏暗，但纵观文坛，总还不至于怎么冷落、萧条。所以透过“风潇雨晦”的雾障，一定会渐次开朗，从而得已于风雨过后见彩虹，让人们领悟到另一番别有意趣的文坛新面貌也未可知。岂不闻梁启超当年在《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》一文中就曾道出：“当此国基甫定，风潇雨晦之时，正全体国民卧薪尝胆之日。”“卧薪尝胆”图的就是来日“胜况”。谁能说《文坛茶话图》中，鲁迅和巴金交谈的就一定不是这些话题？！不仅如此，我甚至觉得邵洵美于端坐中露出一脸微笑后面，他亟想表达的，也分明是对那个年代文坛抑或出版前景的一种自信。再看其他那些文坛大家，如茅盾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老舍、冰心，包括周作人等，在他们脸上也没有那种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，因此意欲“拂袖而去”的意思。他们中有些人的彼此关系也许确实说不上怎么融洽，但这里也绝对没有丝毫“剑拔弩张”、“水火不容”的况味。相反，这里更多透露出的是一种大家平心静气，期待共商当前或今后中国出版乃至文坛大事的迫切之情。这一点，从这些当年的文坛大佬能在这里相聚茶话，尤其是从这场文坛茶话会简单朴素的招待规格看，想必作为“东道主”的邵洵美，也不会特意给大家发什么“车马费”或会议红包，或会后留以高档宴席之类待遇的吧！

当然，其实我在这里还想说的是，希望读者能允许我在看待“恩怨”一词上，或可拓宽一下视野，即跳出传统意义上对“恩怨”一词狭义解读的“窠臼”。举例言之，比如“恩怨”一词还让我想到可与“德”组词。“恩德”者，恩惠之谓也。在这里，恩惠的授者与受者既纠缠又交集。正是这种纠缠和交集，让我们看到了“恩怨”之外，尚有恩德。正如“怨”字同样可以组词“抱怨”、“埋怨”一样。

事实上不少人世间的恩怨故事，一般来说，实在是逸出我们理解上的通常经验的。因为除了不难看到的世俗恩怨，其间不论是其中的“恩”也好，“怨”也罢，读来分明让人感到往往还有怎一个“情”字了得！殊不知，这“情”既包含了“恩”——恩爱之情，也蕴藏着“怨”——离人之怨！这样的“恩怨”，于今看来，或许与我

们习以为常的理解会有所相悖乃至颠覆。只是这样的相悖和颠覆，其实不也正好从另一个侧面，昭示且印证着人心的叵测和世事的复杂吗！

还是以《文坛茶话图》来说事。“不差钱”的邵洵美不乏一颗侠义心肠，比如他常接济穷学生徐悲鸿，但他对散金济人的事从不挂在嘴上，可是他对徐悲鸿发表看法时，却会不知是激将还是真这么以为地说上一句“没才气”、“国外三流画家”云云，其恃才傲物于此也可见一斑。而想来徐悲鸿听到这话，即使嘴上没有什么“怨”，至少心里不会舒服。可众所周知的是，事实上徐悲鸿的勤奋和日后所取得的学术成就，绝对不逊色甚至远超过邵洵美。由此观之，我们是否可以对“恩怨”大可不必咬文嚼字，某些时候仅仅将它视作一种象征抑或符号也无不可。一如帕斯卡尔《思想录》“论象征”篇所写的：“象征具备了出现的和不出现的，欢乐的和不欢乐的。——符号具有双重意义：一重是明显的，另一重则据说其意义是隐蔽的。”

陆其国

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八日

目录

且说一场文坛“茶话会”（代序）

严 修：大总统之“投桃报李”	001
王筱汀：“说三道四”无关恩怨	012
梁启超：解铃还须系铃人	017
杨 度：“誓约”无怨	025
陈独秀：有些“偶然”绝不能小觑	034
史量才：秋水伊人何处寻	041
陈 垣：书屋而今号“励耘”	050
鲁 迅：交谊内山书店	058
邵飘萍：“铁肩辣手”著文章	068
金毓黼：余不肯为，亦不忍为	073
陶行知：别忘了报答穷孩子	077
胡 适：“忘却”与“不语”	082
陈鹤琴：医生医病，我是要医人	086
顾颉刚：莫让此生有恨怨	094
吴 宓：释怀恩怨一段情	100
洪 深：疾恶如仇的爱国者	104
徐悲鸿：上海青葱岁月往事	113
邹韬奋：婚事·家事·国事	121
郁达夫：恩怨缠绕的爱情	127

徐志摩：“私人档案”风波	136
杜重远：疾恶如仇，从善如流	141
郑振铎：“恩怨”分明的文化抢救	148
瞿秋白：体悟恩怨皆是情	163
梁思成：一包珍档佚事	172
石评梅：青年人的心，付与春光吧	180

后记





严修（一八六〇～一九二九），直隶天津（今天津市）人，字范孙，号梦扶，别号倬扁生。教育家、学者、书法家。革新教育、推进教育现代化之先驱，被誉为“南开校父”。著有《严修东游日记》、《严氏两世事略》、《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》、《蟬香馆手札》、《蟬香馆书牘》、《欧游讴》等，后人编有《严修手稿》。

严修：大总统之“投桃报李”

严修于袁世凯，可以说是恩怨相杂。晚清时袁世凯被逐出政坛，且命也险些不保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。此时严修毅然站出来，不仅为袁世凯向当局讲了公允话，还到火车站送别袁世凯。袁世凯感恩在心，因此民初执政后，一心要“报恩”严修。后者亦在信中表示“夙受总统恩遇之隆，罔有伦比……”但而后当袁世凯要做皇帝、严修决然反对时，袁世凯对他又由此生怨。

袁世凯痛恨科举，但不轻慢教育

一九一六年六月，袁世凯临死之前，称严修是他的“生平直友”。袁世凯一生读书不多，但却丝毫不敢藐视教育。而且随着地位越高、权力越大，他对教育越是怀有一颗敬畏之心。这一切，我们通过他重视抓子女的教育上可充分领略。袁静雪在《我的父亲袁世凯》一文中写到，父亲不仅为子女们设家塾、请家庭教师，还家里设女馆，让他的几个姨太太读些书。所请“汉文老师”中，就有学者严修。

尽管袁世凯自己当年在考场铩羽而归，后来崛起于疆场，但他绝非一

“文”不名的赳赳武夫。当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向朝廷密上的荐贤书中，就曾将袁世凯划入“知兵文臣”：

际此时局艰难，知兵文臣甚少，如袁世凯者，伏愿皇上擢以不次，俾展所长，及其年力正强，得以功名自奋，庶立尺寸之效。

至于袁氏后人中多为读书种子，更出了如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这样的科学大家，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袁氏家族的教育渊源。而严修能在民初教育舞台上创出佳绩，正是缘于袁世凯对他的“报恩”。

严修，一八六〇年生于顺天府三河县（今河北省三河市）。严氏先世为浙江慈溪籍，清顺治年间严修七世祖严应翹因经商迁居天津，遂为天津籍。严修二十三岁中乡举；第二年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；二十七岁庶常散馆，改翰林院编修，补国史馆协修；三十岁充会典馆详校官；三十一岁充各直省乡试试卷磨勘官；三十五岁授贵州学政。学政也就是地方教育长官。任职贵州学政，对严修来说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一八九四年九月，严修轻装简从，只带了十四箱



袁世凯

书，一路取道清苑、安阳、郑州、新野、江陵、常德、沅陵进入贵州。这段里程，差不多走了三个月，直到十一月才安抵贵阳上任。这是严修从事教育的肇始。

到达目的地后，稍事休息，严修就动身到各州县命题课士，深入基层有针对性地出题考考生。到了地方，严修通常先发出一份《观风告示》，以向考课生员打招呼，然后再向他们出策论四题：一、辨志；二、明师；三、评文；四、匡时。通过第一题，可以了解考课生员的志趣、志向高下；通过第二题，可以知道考课生员对明师的理解和认识；通过第三题，可以测验考课生员阅读文章的目光深浅；通过第四题，可以看出考课生员对时政的洞察程度。不久，严修又发布《劝学示谕》文告，他在文告中心部分强调指出：

天下之治乱，视乎人才之盛衰。今日读书，他日致用，非止为进取也。

严修在贵州教育大员任上，一干就是三年。三年中，除了严肃教学之风，如严禁考生冒籍、替考外，对补廪、候

廪、出贡的生员交纳上费诸弊政，也均予以革除。他还多方筹资，给学舍添置书籍，供士子阅读。后来又与地方当局商议，筹立官书局，刻印新旧书籍。如张之洞著《书目答问》这类读书指导书，经翻刻后流传很广。可以说，三年贵州学政的经历，为严修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严修此行贵州，所带十四箱书中，有《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》、《林文忠公政书》、《胡文忠公遗集》、《沈文肃公政书》、《左文襄公奏议》等。他在书目上注云：

此五书于时事切近，有志于经济者，不可不读。

严修说的“经济”，指的是经世济国。

严修在贵州学政任上所做对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件事，即是一八九七年九月奏请于科举外开经济特科，破格录才。严修这份奏折“不仅切中科举制迂腐空疏的积弊，打破了唯一的通过八股以取士的渠道，也为学习西方文明，使新兴的有维新思想与技能的人才跻身政治舞台，打开了一线通道”。

做教育家，不做朝廷命官

一八九五年袁世凯开始小站练兵。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，严修任贵州学政期满离黔。翌年三月辗转回到天津，前往小站拜会时任营务处总办的老

友徐世昌，适遇袁世凯也在那里，徐世昌便把严修介绍给了袁世凯。袁世凯与严修相识后，两人曾作“畅谈”。严修在教育上的一些思想和观点，袁世凯遂

有所知。

“义和团”事起后，严修深感启迪民智的重要。他希望中国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，有一番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，为此，他很想赴日考察学习日本的教育。

一九〇二年严修赴日考察教育的愿望终于实现，在教育思想方面受到很大启发。比如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所说“取人文明，则己之文明自进”这句话，严修就深感“其言简括得体”。由是更深切地认识到，要使中国富强，必须从普及教育入手；学他国之长，兴办教育。

回国后，严修即在自己家里创办新式学校——严氏女塾，开创了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。同时与林墨青等友人商议，兴办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（今天津市南开区仓廩街小学），这是天津有正式小学之滥觞。

一九〇四年，由于严修的推动，天津除了已有多所民立小学、官立小学外，又筹设了一所工艺学堂和九所为贫寒子弟而设的半日学堂。

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，他对严修的教育事业很关注，这时候便抛出了橄榄枝——力邀严修出任直省学校司督办，负责全省教育。严修向袁世凯提出一个



要求，希望上任前先去日本继续考察那里的教育，回国后再正式赴任，获得同意。

严修携张伯苓等十一人在日本考察教育两个半月。回来后他向袁世凯汇报了赴日考察的收获，及自己上任后的打算。这年秋天，严修将严馆、王馆合并，成立“私立中学堂”；后改名“敬业中学堂”，再改名“私立第一中学堂”，校长张伯苓，此即今天津市南开中学前身。严馆即严修在自家所设私塾；王馆即天津邑绅王奎章在自家所设私塾。私立中学堂成立后，严修手书四十字《容止格言》教育学生：

面必净，发必理。衣必整，纽

必结。头容正，肩容平。胸容宽，背容直。

气象：勿傲，勿暴，勿怠。颜

色：宜和，宜静，宜庄。

严修没有要求学生在读书上必须做到什么，而是在做人上先要做到什么，这就是他那个年代最好的人文教育。

这期间严修还曾面谒袁世凯，“力陈科举之弊，非罢废不足以言兴学”。袁世凯接纳了这一思想，并与张之洞在一九〇五年九月二日联名奏请“立停科举，推广学校”，导致清政府最终废止科举。

同年十二月六日，清政府设立学部，“翰林院编修严修，著以三品京堂候补，署理学部右侍郎”。这本是提拔美事，不料严修却“不赴”。原来他念兹在兹的还是自己的学校。不过最后他还是被迫赴任。

在京为官，严修和袁世凯见面的机会也多了，袁世凯对他在教育方面展露出来的卓见和行迹愈加钦佩，有一次甚至发话：

吾治直隶之政策，曰练兵，曰

兴学。兵事我自任之。学则听严先

生之所为，吾供指挥而已。

袁能当众放言，在教育兴学之事上授权

严修，甚至可以“指挥”他袁世凯，这话岂会轻易说出口！而最让袁世凯感恩严修的，则是在他大祸临头，险遭杀身之祸，众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时，严修却不顾危及己身，一如既往地和他交往。

此事缘起戊戌变法期间，由于袁世凯涉嫌出卖光绪皇帝，导致变法失败，多位维新人士被杀，光绪也被慈禧太后囚禁瀛台。后随着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、十五日，光绪和慈禧相继离世，大清政权由慈禧钦定的光绪之弟载沣执掌，称“摄政王”。他上位后便欲除掉袁世凯。

这时候，许多以前巴结袁世凯都来不及的大小幕僚，开始纷纷躲避他，而严修却非但不远离，还力排众议，向朝廷上疏，为他说话，表明自己这样做是“盖为袁世留异才”。最后袁世凯终于幸免一死，只是被开除公职，贬回老家。当袁世凯凄凉地离开京城时，严修一直将他送进火车站。袁世凯临上车，不胜感慨地说，如此厚爱，袁某铭记在心。

不久，严修也称病离开官场。他于一九一〇年三月奉谕“准奏开缺”，学部任职至此结束。

坚不受恩，严辞为官

严修和袁世凯远离了官场，但二人

的交谊却未远离，尤其袁世凯对严修心

怀感恩。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二日，严修偕友人林墨青和长子智崇、侄子智惺出游时由北京经彰德（治今河南安阳市），袁世凯知道后，特地派儿子克文到车站迎接，请严修住到他那里去。严修不想打扰袁世凯，婉言谢绝，然后下榻西关外天保客栈。

次日，袁世凯派人给严修送来一些当地特色美食佳肴。饭后又派车执意接严修一行去洹上村他那里做客。盛情难却，严修在洹上村游览了袁世凯的庄园，欣赏了他收藏的古人字画，还在那里用了晚餐。两人自有讲不完的话，饭后其他人先回客栈，他们一直聊到十一点后，袁世凯才派车送严修回客栈。

辛亥革命前夕，袁世凯特地送儿子袁克定带着几个弟弟到天津读书，把他们托付给严修。严修感慨于袁世凯对自己的信任，表示会尽一切努力辅导他们。

数天后，武昌起义爆发。袁世凯的命运就此发生逆转，同样也改变了严修的人生。当然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严修的命运是随着袁世凯命运的逆转而改变的。清政府当时已日薄西山，江山岌岌可危，不得已，只得屈尊下请被贬回老家袁世凯出山“督鄂”，希望袁世凯能挽大清王朝于不倒。

这时候的袁世凯回想起三年前被清廷贬回老家时凄凉的一幕，内心里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。现在这一天终于到

来了，他便以退为进向清廷发难：在眼下艰难局势下，我本来应该迅速奉旨出来做事。但是你们以前不是发布过，说我患有足疾。我足疾至今没有痊愈，近日天气又突然变冷，引发我咳嗽气喘，头昏心跳，神情恍惚。总之，袁世凯说了一大通话，其潜台词无非是在告诉清廷，三年前你们说打发我就打发了，现在想到要用我就来召唤，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！而且召唤我也只是让我出来当个“督鄂”大员，我岂是这样随便好使唤的？所以袁世凯最后说，我这足疾当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，等稍好些，我就奉命赴任。我还要藉此回报朝廷待我的厚恩呢！

朝廷知道袁世凯有满腹怨恨，也听得出他话里有话。但在此非常情况下，也只能放下至尊的身段。于是在十月下旬颁四道上谕，其中第二条为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。这一来，袁世凯顿时权倾朝野，他终于答应出山了。重新出山的袁世凯开始组织内阁，推举国务大臣，其中拟请严修出任度支部大臣，让他执掌财政部大权。此举不管是否含有对严修的“报恩”之意，但袁对他的器重是明白无误的。

消息传出，有人连忙到严修家里向他祝贺。意外的是，严修脸上毫无喜色。他已无意为官，“余自归田后，决不再作出山之想，国务大臣岂余所能胜任，况度支之关系尤重耶？”严修“决

计恳辞”。第二天，即电请内阁代奏，收回对他的任命。严修在电文中称，自己既无专门学识，又无治事能力，且体弱多病，“万难胜国务大臣之任。……惟有恳请代奏，吁恳天恩，收回成命。谨请代奏，不胜悚惶之至！”

然而，袁世凯却不这样认为，他致电严修，语多掏心掏肺：

凯夙乏新知，谬膺重寄，昨据信条，组织内阁，奉旨简阁下为度支大臣。阁下夙秉公忠，热心政治，当此事机危迫，诸赖荃筹，籍匡不逮。即希迅速北上，共支危局，无任翘盼。

袁世凯一方面显然是要向严修“报恩”，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把严修视为左右股肱，希望他能助自己，成就一番伟业。

但严修仍不想改变自己的想法，仅隔一日即电复内阁，言辞恳切地希望“仍准开缺，另简贤能，以重阁制，而维国计”。

可是袁世凯仍不改初衷，执意请严修出山。而且关于出任度支部大臣的事尚未拍定，袁世凯又让严修作为北方议和代表团成员，参加辛亥南北和谈。严修对此同样婉拒：

惟修识浅词呐，置之议场，实非所宜。

此时的严修，真的是厌倦官场了，哪怕仅仅是出席南北和谈。这一时期严修最热衷的事是看戏观剧，“自辛亥九月以

来，（严修）几乎每日赴天仙茶园等处观剧。……其所以常去者，一以表示地方安宁，居民不必自相惊扰；一以表明优游自在，绝无出山之意，从而可以摆脱作官生活也”。由此可见，严修想淡出官场确属发自内心。而且难能可贵的是，严修再不想涉足官场，并不代表他不关心国是，他在婉辞自己作为北方代表出席南北会议的同时，就向袁世凯表示，如果需要，他可以推荐合适人选与会。一九一二年元旦过后不几天，严修致函袁世凯，就南北和谈事向他献策，针对所拟定出席人员发表己见，觉得这些成员“夙持君主立宪主义，而议论纵横，又能达其所见，期有一人可得一人之用”。接着他又自谦地说，“若晚者，于中外法律既懵无所知，而语言呐呐不能出口，徒占一人之地位，不惟无益，而且有损。捐威纳侮，不战先绌，诚何取焉。拟请不必列入，以免迁就贻误。知我莫如公，当不责其退缩也”。话说得如此诚恳，道出的也确是实情，在此情况下，袁世凯终于没有再坚持要严修任职度支部大臣。但在内心，他始终记怀着在自己最失意的时候，严修对他的不弃之情，总想着要向严修“报恩”。

接下来，三月十日袁世凯终于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。第二天，他就请严修担任治安会长。仅过一天，又想请严修任总督，遭严修“正色辞之”。当年十一月，袁世凯请严修出任国史馆